

近代汉语 有标记被动句研究

◎ 郑宏著



本书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近代汉语 有标记被动句研究

◎ 郑宏 著

JINDAI HANYU
YOUBIAOJI
BEIDONGJU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研究 / 郑宏著. — 北京 :
语文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80241-530-0

I. ①近… II. ①郑… III. ①汉语—句型—研究—近代 IV. ①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0831号

责任编辑	金春梅
装帧设计	徐晓森
出 版	 语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bsywp@163.com
排 版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 格	890mm × 1240mm
开 本	A5
印 张	8.125
字 数	204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定 价	25.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 and 材料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4)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方法	(13)
第二章 近代汉语“被”类被动句	(15)
第一节 “被”字被动句	(16)
第二节 “蒙”字被动句	(32)
第三节 “遭”字被动句	(52)
第四节 “吃”字被动句	(63)
第五节 “着(著)”字被动句	(87)
第三章 近代汉语“叫”类被动句	(109)
第一节 “教/交”字被动句	(109)
第二节 “叫”字被动句	(126)
第三节 “让”字被动句	(148)
第四章 近代汉语“给”类被动句	(162)
第一节 “与”字被动句	(163)
第二节 “给”字被动句	(178)
第三节 “把”字被动句	(215)

第四节 “拨”字被动句	(224)
第五节 “乞”字被动句	(227)
第五章 余论	(236)
第一节 近代汉语被动标记的规律性	(236)
第二节 近代汉语被动标记的发展线索	(238)
参考文献	(241)
引用文献	(252)
后 记	(255)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和材料

一、研究对象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近代汉语三类不同来源的有标记被动句式，分别为“被”类、“叫”类、“给”类。本书的研究重心集中在“被”“叫”“给”这三个被动标记上，对和它们有着相同来源的其他一些被动标记也进行分类研究。如：被动标记“被”是由遭受义动词发展而来的，在近代汉语里有着相同来源的还有“吃”“着”；被动标记“叫”是由使役动词发展而来的，在近代汉语里有着相同来源的还有“教”“交”“让”；被动标记“给”是由给予动词发展而来的，在近代汉语里有着相同来源的还有“与”“把”“拨”等。本书将对这三类被动标记的产生、发展、演变进行历时考察，通过描写与分析试图找寻这三类不同被动标记的内部发展机制，并作出合理解释，以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

本书兼论现代汉语及汉语方言中有标记的被动句式。现代汉语书面语表示被动多用“被”字句，而在口语中表示被动多用“叫”“让”“给”。汉语方言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被动句式，如西南官话的“着”字句、吴语的“拨”字句、湘语的“把”字句、

粤语的“畀”字句、闽南语的“乞”字句和“互”字句等，其中可以追溯到近代汉语源头的被动句式也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二、研究范围

“近代汉语”是汉语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由于各人对汉语发展史分期的意见不同，近代汉语所包括的范围有多种说法。^①王力（1958）认为，公元13世纪到19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汉语时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吕叔湘（1984）认为，近代汉语时期应确定为晚唐五代：“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潘允中（1982）认为，自宋元明清至鸦片战争以前，是近代汉语时期。胡明扬（1992）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从隋末唐初到明末清初为近代汉语时期，并认为近代汉语内部可分为早期（隋末唐初到五代北宋）、中期（宋元）、晚期（元末到清初《红楼梦》以前）。其分期标准为：①语音上阴阳入对应的严整格局开始动摇，入声韵尾 -p、-t、-k 相混到消失；全浊声母的清化；-m 韵尾的消失。②语法上“的了哩 / 呢”的出现和全面替代旧的助词系统；“这那”替代“彼此”；“将”字句、“把”字句的出现和发展；“动 + 将 + 趋”的出现、发展和消失。③语汇中“我你他”（还有“们”）的出现和全面替代“吾汝其”等古汉语人称代词。袁宾（1992）提出汉语历史阶段由主干部分与交替重叠部分组成的意见，暂把南宋、元代、明代和清初作为近代汉语阶段的主干部分，其上沿可以前推几个世纪，下沿可以向后延伸几个世纪。蒋绍愚（1994/2003）综合语音和语法，将唐代初年作为近代汉语的上限，将18世纪中期或清初作为近代汉语的下限。

^① 见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论》绪论第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由于各家所持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所以近代汉语上限和下限的认定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语言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语音、词汇、语法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单单靠一条或几条标准将汉语史截然划分开来,本身也是不合理的。然而,对汉语史进行研究,不做大致的分期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根据现在保留下来的比较接近口语的材料,并综合各家的看法,把唐初至清初这段时间定为近代汉语时期。同时,考虑到研究的连续性,本书将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的过渡时期,即清中叶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段时期也囊括进来,纳入研究的范围,以确保研究结果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本书兼论现代汉语及汉语方言被动式,研究的范围除了上文提到的近代汉语,对现代汉语及汉语方言的被动式也略有涉及。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的部分口语材料、方言材料也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三、研究材料

本书选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比较接近口语并具有代表性的语料作为研究材料。

近代汉语时期选用的语料有唐代佛经、语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朝野僉载》、《全唐诗》、敦煌变文、《祖堂集》,宋代《朱子语类》、《全宋词》、南宋佛语录、宋元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元代《老乞大新释》、《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训世评话》、《全元曲》、《元刊杂剧三十种》,明代《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西游记》、“三言二拍”、《山歌》、《型世言》、《金瓶梅词话》、《金瓶梅》(崇祯本),清代《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孽海花》、《文明小史》、《九尾龟》、《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小额》(节选)。

现代汉语时期选用的语料有鲁迅、李劫人、巴金、老舍、茅盾、钱锺书、张爱玲、赵树理、王朔等作家的部分代表作品。本书所列之材料比较繁杂，是因为上述作家的某些作品明显具有汉语方言色彩，为方便进行比较而选取。

第二节 研究现状

有标记被动句是汉语重要的句式之一。殷商时期的“于”字句、春秋战国的“为”字句和“见”字句、西汉时期的“被”字句，都属于有标记被动句。到近代汉语时期，有标记被动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除了占有主流地位的“被”字句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外，近代汉语时期还产生了多种新型的被动句式，如唐代的“着（著）”字句、“与”字句和“教”字句，宋代的“吃”字句，元代的“把”字句，明代的“叫”字句、“拨”字句和“乞”字句，清代的“让”字句和“给”字句等。近代汉语中这些有标记的被动句，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或在语法史的著作中有所提及，或在单篇论文中进行详细分析，但全面和系统研究近代汉语被动句的专著并不多见。可喜的是，近两年来学界陆续出现了一批学者致力于汉语被动句的研究，如屈哨兵、张延俊、曹凤霞等，在认知、功能、语法化等方面对汉语被动句进行了纵深的研究。

一、语法史著作中涉及的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研究

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各种语法史专著中。“被”字句是一定在列的。王力《汉语语法史》（1989）从汉语史的角度细致地勾勒出“被”字句的发展过程；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1982）简略地指出近代汉语“被”字句不同于前期的三点发展；袁宾《近代汉语概论》（1992）从语法史和“被”

字历史发展两个方面证明“被”字句的逐渐成熟；向熹《简明汉语史》（1993）主要论述了“被”字句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即关系语、谓语的进一步复杂化，反向被动句的增加和“被”字语义的进一步虚化；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论》（1994/2003）详细分析了“被”字句的产生；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1997）对“被”字句的论述大多是转引他人观点，进而作出总结；俞光中、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1999）着眼于“被”字前被动受体的有无，对“被”的“不幸”意义作了深入分析；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2000）就“被”字句句子的成分的复杂化和语义结构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讨论；袁宾、徐时仪等《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2001）就各学者对近代汉语被动句的研究进行了综述；蒋绍愚、曹广顺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2005）针对各学者对近代汉语被动句所作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客观地展现了各学者在此类研究问题上的优势与缺憾。

除了“被”字句，近代汉语时期其他有标记被动句的研究在上述相应的著作中虽然略有论述，但均不是研究的重点。这些著作对被动句简单地进行了列举和分析。王力（1989）谈及了“叫”“让”“给”可以表示被动；潘允中（1982）提到“吃”“叫”“给”用于表示被动，并对“吃”表示被动的来源作出了假设；袁宾（1992）把被动标记分为“着”“做”、“把”“拨”、“教”“叫”和“得”四种类型，但对其来源并未深究；向熹（1993）列举了除“被”字外的近代汉语时期表示被动的介词，如喫（吃、乞）、教（叫）、与、着、把、给，并对其来源进行了简单的分析。综上所述，语法史著作对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的论述仅限于简单的描写，并未展开深入探讨。也有些著作对有标记被动句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个案研究和来源分析。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87/2003）对“教（叫）”“让”表示被动有了初步的关注，并对使役动词表示被动的原因作出了解释；蒋绍愚

(1994/2003)对近代汉语使用使役动词表示被动,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两个方面作出了阐述;冯春田(2000)将具有被动语法意义的句式按照动词类别的不同分为“授与”“使役”“遭受”三类,从这三类动词入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蒋绍愚(2005)对近代汉语“吃(喫、乞)”字被动句、“教(交、叫)”字被动句、“与”字被动句和“给”字被动句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并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观点,是语法史著作中对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阐述最为深入的。

还有一些专书语法研究,其中也涉及了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式。如冯春田《聊斋俚曲语法研究》(2003),吴福祥《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2004)、《〈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2004),黄锦君《二程语录语法研究》(2005),李炎《〈醒世姻缘传〉及明清句法结构历时演变的定量研究》(2006),许仰民《〈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2006),田春来《〈祖堂集〉介词研究》(2012)等。

近十年来,出现不少硕博论文研究被动句式。如史在宏《〈金瓶梅〉被动句式研究》(2006)、吕思洁《〈水浒全传〉“被”字句及“被”字结构研究》(2007)、高成建《“二拍”被动式研究》(2008)、曹思海《〈醒世姻缘传〉“被”字句研究》(2010)、李佳妮《“二程语录”被动式研究》(2011)、刘英《〈西游记〉汉语被动式研究》(2012)、李森森《〈型世言〉被动式研究》(2013),从共时角度对近代汉语时期专书中的被动式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和考察分析。也有从历时角度对汉语被动式进行研究的专著。张延俊《汉语被动式历时研究》(2010),对从远古到近古时期的无标记被动式和有标记被动式均进行了历时的考察,并就汉语被动式形成与发展的原因、机制和规律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具有创新性;曹凤霞《汉语被动标记更替历时研究》(2014)对汉语上古、中古、近代的有标记被动式的形成、发展及标记更替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中不乏对形成机制的探讨,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材料广泛。张延俊的研究对汉语被动式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内容偏重于对汉语无标记被动句的研究,对有标记被动句的研究主要落在了句法上;曹凤霞的研究注重汉语有标记被动式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更替性,研究的内容着重于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有标记被动式,对于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式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二、研究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的论文

研究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的论文是比较丰富的,研究的内容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被”字句的进一步探讨

“被”字句产生初期比较简单,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形式,许绍早(1956)、向熹(1958)、吕景先(1980)、袁宾(1989)、唐钰明(1988)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其中唐钰明《唐至清的“被”字句》通过定量分析对近代汉语“被”字句进行定性,文章中不乏同时代文言与白话的横向比较、不同时代语言的纵向比较,对唐代至清代的“被”字句进行了详尽的历时考察与共时分析。专书研究近代汉语“被”字句的论文则比较深入。曹小云(1990)、黄锦君(2002)、丁勇(2006)、谢燕琳(2006)分别对《朝野僉载》《二程语录》《元典章》《三遂平妖传》的“被”字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许仰民(1990)、方经民(2006)分析了《金瓶梅词话》中被动式的使用情况,并与《红楼梦》中的被动式进行了比较研究;陈昌来、李琳(2006)以《儿女英雄传》中的“被”字句作为参照,与此前的“被”字句和此后的现代汉语“被”字句进行比较研究,试图找出“被”字句演化转变的线索;高霄、王慧青(2005)通过对《红楼梦》“被”字句的句法结构、使用频率、运用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展现了“被”字句的总体特

征和应用特点。

（二）对“喫”“吃”“乞”字句表示被动的探讨

江蓝生（1989）、张惠英（1989）最早开始关注“喫”“吃”“乞”表示被动的来源问题。江蓝生考察了《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清平山堂话本》里“喫”“吃”“乞”的用字情况，指出饮食义的“吃”不与“乞”混用，遭受义、被动用法的“吃”在《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里多与“乞”混用，而在《清平山堂话本》里则避免用“吃”，只用“乞”。“乞”是“吃”的同音借字。江蓝生倾向被动标记“吃/乞”由动词遭受义发展演变而来。张惠英认为，“乞”表被动是从给予义发展来的。《敦煌变文集》中“喫”的被动用法还未成熟。《金瓶梅词话》和《山歌》中“喫”“吃”“乞”在用法上完全一致，都用来表示被动、挨受、原因，而不用来表示给予，但是“乞”在近代汉语中确实存在给予义，在现今某方言中也仍用“乞”表给予，当时不用的原因是这两部书的作者有意回避使用给予义的“乞”。江张二人在“喫”“吃”“乞”表被动的来源问题上各有理由和观点，值得深入思考。许仰民（1989）描述了《金瓶梅词话》“乞”字句和《水浒全传》“吃”字句的使用情况，客观描述语言事实，未涉及“吃”“乞”来源问题的探讨。马兴芳（2001）从“吃”的词汇手段和语法手段表被动这两个角度考察各自的格式使用情况，认为被动关系词“吃”来源于其动词“遭受”“挨”义。王虎、金御真（2011）考察汉语史特定阶段的特殊句式——“吃”字被动句的发展过程和语法化机制。周杨、张菊萍（2008）从语音的角度对被动标记“吃”的消失给予解释，角度新颖。

（三）对“给”字句表示被动的探讨

学界对“给”表被动的来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张惠英（1989）认为，“乞”字句就是后来的“给”字

句,“给”正好承接了“乞”表给予、被动的用法(即表给予的“乞”—表被动的“乞”—表被动的“给”);②本涅特(1981)认为“给”从表示给予到表示被动,存在表示处置的中间环节(即表给予的“给”—表处置的“给”—表被动的“给”);③太田辰夫(1959)、桥本万太郎(1987)、蒋绍愚(1994/2003)、李炜、濑户口律子(2007)认为,表给予的“给”向表被动的“给”转化的中间环节不是表示处置的“给”,而是表示使役的“给”(即表给予的“给”—表使役的“给”—表被动的“给”)。目前,学界比较倾向第三种观点,即表被动的“给”由给予动词“给”经过使役动词“给”发展而来。

(四)对“教”“叫”“让”字句表示被动的探讨

太田辰夫(1987/2003)、蒋绍愚(1994/2003、2002)、江蓝生(1999)、张延俊(2011)对这类使役动词表示被动进行了专门研究,通过历时分析与共时描写相结合的方法探寻使役与被动兼用的原因以及发展演变的过程;李崇兴、石毓智(2006)从语法化的视角探讨了自唐代以来“叫”字句的发展轨迹;杨月蓉(2007)分析了“教(叫)”被动与使役互转的原因。朴乡兰(2011)分析了“教(叫)”字句从使役到被动的演变过程,其转化原因不是受事前移、主语省略,而是反身致使句发展的结果。

(五)对其他有标记被动句式的探讨

袁宾(2005)论述了“蒙”字句的产生过程和发展情况,说明了语言的类化机制是“蒙”字句顺意倾向产生并强化的深层动因;田春来(2009、2010)、张振羽(2010)、张延俊(2011)对“遭”“着(著)”的被动用法进行历时追溯,揭示其作为被动标记的历史事实,并对演化途径作出了解释。

对近代汉语被动式进行研究的单篇论文中,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被”“叫”“给”这部分被动标记上,而对极个别的曾经在近代汉语时期出现过的被动标记,如“着

(著)“蒙”“把”“拨”的论述和研究相对较少。在上述研究中不乏对被动式的来源及其演变原因给予发展性的说明,对个别被动标记也给予了详细的理论阐释和事实分析,不足的是缺乏共时平面的对比研究,近代汉语被动句的内部发展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三、涉及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被动式的专著和论文

研究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被动式的专著并不多见。屈哨兵《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研究》(2008)对现代汉语被动标记进行了个案研究,在论述过程中描写与解释并重,把被动标记的意义衍推和认知分析作为考察的重点,研究颇为详尽;石毓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2006)一书的部分章节从语法化和认知的角度对被动标记“叫”“让”“给”进行了历时考察,对现代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被动标记有所涉及,并试图发现这些被动标记所隐藏的内在规律性。

研究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被动式的论文比较多。桥本万太郎(1987)已经注意到了近代、现代汉语的被动式,从语言地理类型学的角度分析了汉语南北方言被动标记的不同与历史上汉语跟相关语言接触的关系;张振兴(1999)对汉语各方言中表示被动的标志词分别进行了描述;何洪峰(2004)解释了现代汉语被动标记产生的原因;王振来(2006)从语法化和方言的角度考察了汉语的被动标记;黄行、唐黎明(2003)以我国某些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为例,进行了被动句跨语言类型的比较;石毓智(2005)运用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对古今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被动标记进行比较研究,着重探讨汉语被动式和其他语言的被动式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张惠英(2005)对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语言的被动词,南亚语系的几种语言的被动词进行了研究;戴庆厦、李洁(2006)研究了景颇语的“NP+e³¹”式的

语义、语法及语用特点，为汉藏语的被动句研究提供参考。

李炜（2004）对清中叶以来北京话的“给”字表示被动进行了论述；木村英树（2005）提出北京话给予动词“给”字的被动介词功能不是由“被使动者”标识功能扩展而来，而是由“受益者”标识功能扩展而来的；李宇明、陈前瑞（2005）运用定量的方式考察有标记被动句的使用情况，并且考察了“给”字被动用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制约因素，认为北京话的介词“给”是在助词“给”的诱导下逐步发展出被动用法的；洪波、赵茗（2005）认为汉语给予动词的使役化和使役动词的被动介词化，都是由于认知上的前景凸显因素导致原来结构的重新分析而发生的，为汉语给予动词演变为被动标记提供了理论支持。

江蓝生（1999）探讨了使役与被动兼用的原因，并指出在汉语方言中确实存在北方用使役动词“叫”“让”兼表被动、南方用给予动词表被动的情况；何忠东、李崇兴（2004）分析了汉寿方言被动标记“等”的特点及成因，认为被动标记“等”源于使役动词“等”，使役与被动兼用是一种规律性的演变；周磊（2002）主要描述乌鲁木齐话的被动标记“让”；储泽祥（2006）从句法语义表现、语用考察等方面对赣语岳西话表被动的“让”字句进行了分析。

李海霞（1994）、丁崇明和荣晶（1994）、张定（2006）对四川方言、昆明方言、枞阳方言的被动标记“着”进行共时平面的描述，并对“着”字表示被动的现象作了必要的考察；崔显军、张雁（2006）对汉语方言中的表示被动的“着”进行了地域考察。

甘于恩、黄碧云（2005）对吴语的“拨”字句和湘语的“把”字句进行了方言描述和共时、历时考察；周芸（2007）重点介绍了句容方言“把”字被动句的句法格式、结构特点、语义特点以及被动标记的来源。

此外，方言工具书，如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

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等,其中记录了丰富的现代汉语方言被动句材料;一些方言调查报告、方言语法研究专著,如山西、山东方言志,湖南方言研究丛书等,其中涉及方言被动句的描写与记录,为方言被动句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语言材料。

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的研究,研究内容从共时的描写到历时的考察,从历时的研究到方言的印证,从概括的研究到个案的研究,从内部机制的挖掘到外部动因的分析,研究方法从描写到解释,从综合到比较,从数量统计到性质分析,运用语法化、认知理论、生成语法等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内容是全面丰富的,方法是多样新颖的。虽然现有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但是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的复杂性决定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如:

1. 研究不平衡。对现代汉语共同语中仍在使用的被动标记“被”“叫”“让”“给”的研究较多,对近代汉语出现且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仍使用的被动标记“着(著)”“吃”“乞”“与”“把”“拨”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2. 研究不够系统。近代汉语有标记被动句的研究大多限于个案的研究,对被动标记的来源和被动句的分化研究力度不够,缺乏上溯下延的连续性与归类研究的系统性。

3. 有些理论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对近代汉语被动标记历时发展中的语法化、类化等理论问题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个别被动标记产生和发展背后的动力与机制的解释还不够充分。